

邓小平关于以马克思主义引领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思想探讨

孟东方 吴大兵

【内容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引领是邓小平关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具体体现为哲学社会科学者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搞研究、做学问；立足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律；立足为人民做学问，为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服务又在改革实践中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批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占领我们的主阵地等。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

作者简介：孟东方（1964 -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067）；吴大兵（1969 - ），重庆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重庆 400020）。

邓小平的《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等文章，特别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这些思想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者搞研究、做学问，应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立足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律；立足为人民做学问、为改革实践服务，又在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要批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占领我们的主阵地等。新时期新阶段，深入认识和理解邓小平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思想，对于我们认真学习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等系列讲话精神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哲学社会科学者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学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开启了新时代。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多元思想意识观念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巨大冲击。特别是在经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历史的终结”论一时甚嚣尘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潮从思维方式、认知判断和现实问题多领域多维度质疑、曲解和肢解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在中国的指导地位。这些思潮与西方反华势力的“西化”图谋，构成了中国发展的巨大障碍和危险。这些障碍和危险冲击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曾基于对哲学社会科学意识

形态属性的深刻认识,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①。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邓小平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我国哲学社会学者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济、历史、政法、哲学、文学等”^②,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是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指引。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尖锐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③对于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邓小平在后来的讲话中作了深入阐释,他强调,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比其他思想优越。并强调“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④这是从我们事业能取得胜利的高度,肯定了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根本性所在。

二是哲学社会学者要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理论研究者和传播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是要做到“真懂”。只有做到了真懂,才能“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⑤。如何做到真懂?邓小平指出就是要通过学习,“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⑥。并要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其次是做到“真信”。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⑦。他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面对改革中人们的信仰迷失,他强调,我们“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⑧。

三是要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强调,要结合中国实际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在1979年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他就指出,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⑨。在1980年后期,他更明确强调,只有结合中国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否则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空谈马克思主义。同时,他指出要坚决反对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本本主义”和“拿来主义”都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198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⑩从邓小平上述论述中不难理解,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目前,多元思想交织激荡、价值取向多元,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一轮冲击,突出的表现是在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滋长。他们质疑马列主义,进一步引发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怀疑和不信任,进而衍生出对马列主义的多样“误读”、质疑理论与现实的“误差”。这使得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现象。更为严重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仅仅视为学术研究,予以泛化,以至呈现出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现象。邓小平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思想无疑给我们巨大启示:我国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7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3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4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8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1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页。

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须高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旗帜，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同时，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①。更需要坚持发展的观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者要通过学习、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尤其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自觉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智慧。

二、立足中国实际探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处于探索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以日本、美国、德国等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领域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其所谓“先进”的理论势欲成为“全球化”的范本。走西式发展道路的各种思潮直接冲击着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道路选择自然首当其冲。其中否定哲学社会科学的阶级属性、标榜西方“理论”的价值取向等是最突出的问题。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邓小平从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意识形态这一反映社会客观存在的核心范畴的内在关联，揭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

一是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邓小平认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主要是政治引领。1978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②1983年，针对当时思想战线上的党性弱化和消极现象，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他强调“对我们党员中的作家、艺术家、思想理论工作者，那就首先要求他们必须遵守党的纪律。”^③对于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主张“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④同时，他还从管理体制上，提出了在科技部门中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⑤。

二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早在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⑥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他一直倡导“不仅是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要大力提倡学术讨论和交流。”^⑦同时，他还专门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因为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⑧。针对忽视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问题，1979年，他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特别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⑨

三是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邓小平认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要“补课”，要形成体系。在学科建设上，要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他指出“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需要赶快补课。”^⑩特别是针对我国理论发展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5页。

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28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⑦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35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8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9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1页。

落后西方的现实，他强调“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①另一方面，要坚定树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信。针对20世纪80年代学界的“崇洋”迷雾，他尖锐批评到“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②并强调“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③

通过继承已有的成果和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组织领导上，质疑、弱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象和心理还依然存在并呈滋长势头；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上，还存在目标模糊不清、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等现象。特别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标准评价上，以“国际化”口号为代表的崇洋理论倾向还相当严重，等等。显然，时代发展急切呼唤遵循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因此，我们应始终做到“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这“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④，努力从体制机制上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下的多部门参与和落实的格局；大力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着眼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积极构建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三、立足为人民做学问，在改革实践中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展现新的气象中，也存在诸多的不足乃至危机。尤其是在学科建设发展上，在不少民众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那里，他们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不够到位，甚至存在轻视的观点。突出表现是做学问受干扰、读书无用论盛行，即存在“读书、就业、升官发财”的传统式逐利思想。中国社会的现实是：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实践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科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更需要实践的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作出深刻而科学的解答。邓小平以其深邃的洞见，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和归属、服务的目标和发展的路径作出了深刻思考。

一是立足为人民群众做学问。邓小平反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应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价值遵循。(1)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他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⑤。在分析新时期文艺时，他指出“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⑥(2) 以人民的评判为标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一定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衡量一切言行的最高标准，并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页。

④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0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9页。

以此标准来检验党的领导和作风。这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评判标准。(3) 一切依靠人民。邓小平一直告诫全党: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 要依靠人民。他指出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因此文艺工作者应该 “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 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 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①。

二是为改革和建设贡献智慧。一方面, 邓小平敏锐意识到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科学理论的支撑, 需要大批懂理论的专家。在改革开放之初, 他就指出 “搞四个现代化, 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 要使群众做好准备。许多新的问题, 需要理论界去研究, 去回答, 现在缺少这样的理论家。”^② 同时, 针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思想认识上的懈怠问题, 他强调 “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 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 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 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 免得犯错误, 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③ 对这些现象他进行了尖锐批评。另一方面, 邓小平更是以科学的远见洞悉了什么是现实问题。1979年3月, 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他就指出 “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 最重要的新问题呢? 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 这将是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④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三是立足实践推动理论创新。邓小平认为, 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关注原则问题, 要对党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决策作出科学的理论阐释。例如, 关于如何理解和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 的问题, 1979年3月30日, 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他就指出 “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 而且,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更要实现重大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他深刻指出 “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⑤ 我们看到,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正是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突破了现实中遇到的一个个重大难题, 推进理论创新, 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下, 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不足, 功利观念严重的情况依然存在, 包括无视和淡化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阶级和人民性属性的问题还相当严重。同时, 走向新阶段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 如思想观念多元的冲击、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压力、改革走向深入的挑战、党自身建设的重任等, 都急切呼唤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来支撑和解决。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因此, “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⑥。尤其在实践上,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真正落到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 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 and 有效办法。通过坚持问题导向、结合新的时代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新, 将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领域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成果, 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211、211-212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 第50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40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179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179-180、180页。

⑥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四、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占领我们的主阵地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有段时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喧嚣一时。1983年，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宣扬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进而发展到1986年的学潮事件、1989年的政治风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不仅直接危及我们的理论主阵地，更危及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邓小平审时度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资产阶级错误观点进行了尖锐批评，旗帜鲜明地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针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求始终不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严防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占领这个主阵地。

一是从本质上，揭示了自由化思潮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早在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他就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在这个讲话中他首次提出在思想政治领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他告诫：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①。同时，邓小平对那些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抨击。特别是对那些“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②等曲解、误解和乱解思潮进行了猛烈批评。

二是从内容上，戳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险恶目的。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全盘“西方”的理论思潮叫嚣，邓小平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由于各国社会历史、国情、文化背景等因素不同，现代化模式各具特色，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现代化道路。他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构想。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他明确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③。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鼓吹的中国“现代化须全盘西化，走西方式道路”的错误主张和论调进行了尖锐批评。同时，对那种借口坚持“双百”方针，以“解放思想”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人把“双百”方针曲解为脱离任何原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谁也不能批评或干涉。针对这些错误思潮，邓小平明确指出“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④针对当时文艺界否定党、丑化社会主义的现象，邓小平鲜明地指出“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⑤

三是在方式上，强调全党要抓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教育。邓小平一直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只是时隐时现的政治斗争，更是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全盘西化”的长期的思想政治任务。“既然这是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就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当然，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⑥。他反复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一定不能放松，绝不能纵容和支持自由化思潮的不正常现象。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再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 and 思想政治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34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2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1页。

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① 在面对自由化思潮的挑战时，他要求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②

四是在队伍建设上，主张建设一支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队伍。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长远思考，邓小平以深邃的洞察力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一支党领导的强有力的队伍保障。他认为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 “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③ 中国的发展需要 “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④。同时，他还从人才标准提出要坚持 “革命化” “年轻化” “知识化” 和 “专业化”，要抛弃论资排辈选人用人机制，要创新机制，真正使青年人才、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时至今日，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理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未销声匿迹。相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其变种，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所谓 “普世价值” 和西方 “宪政民主” 等错误思潮，有愈演愈烈之势。他们宣扬 “普世价值”，以泛学术化的思想极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革命领袖、英雄人物、党史国史，以 “反思改革” 为名否定改革，主张西方民主宪政，否定我国政治制度设计，等等。这些都需要通过有效的批评、教育和引导，使人们明辨是非，使科学理论真正入脑入心，进而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强大自信。哲学社会科学也理应坚决地抵制和反对各种西化、分化、非马、反马等错误思潮，自觉增强 “四个自信”，做一名坚定合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者。面向未来，亟待通过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工程，“着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构建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⑤。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繁荣之基，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成功之基。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1、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994年、1993年。
- [2]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 [3] 侯惠勤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4] 马福运 《邓小平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2期。
- [5] 王素琴 《邓小平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编辑：黄华德)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1、22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9页。
⑤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terprises , distributing according to necessary time of social labor , full involvement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in competition , and the separation of government from enterprise management.

Discussion on Deng Xiaoping’ s Idea Concerning the Leading Role of Marxism in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eng Dongfang and Wu Dabing

Sticking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is the core of Deng Xiaoping’ s thought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pecifically , such role of Marxism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ways of research: to conduct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with Marxist stance , viewpoints and methodologies , explore the law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on the ground of Chinese practices , serve the people through research , serve the reform practice while in the meantim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such practice , critique erroneous Bourgeois ideas , and prevent the ideas of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from taking over the main battlefield.

From Global Capitalism to World Socialism – Analysis of Samir Amin’ s Thoughts

Wang Xinyan and Zhou Ke

Samir Amin has been long committed to the critique of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exploration of a socialist alternative. He has elaborated on the polar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 criticized the discourses of bourgeois ideology , and discussed the socialist alternative as solution to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In so doing , Amin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approach of capital critique , clarifi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bourgeois social science ,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idea concerning the critique and superseding of capitalism. In the meantime , we also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bias in some of Amin’ s viewpoints and conclusions as a result of his positivistic view of science , such as his understanding of Marxist economics , critique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socialism of the Soviet Union.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and Control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Also a Critique of Mainstream Western Macroeconomics

Liu Mingguo

A theory of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and contro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ecessary for build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pillars of mainstream macroeconomics and of the capitalist , even imperialist ideology in the West today , the theory of simple (equilibrium) determination of national income and the IS – LM theory , constitute a pseudo – science with a deceptive nature with their replacement of the logic of economics with that of mathematics , and with the expected conclusions derived from a series of fictional and semantically ambiguous concepts and premises contrary to common sense.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China’ s having achieved a mid – level income and of its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 sustainable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requires the socialist macro – contro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That is to say , the three pillars – the financial department , finance department and the public – owned enterprises must focus closely on the three goals of common prosperity ,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 proceeding with a comprehensive use of the policies of “national monopoly,” “levelization,” “exclusive dealer” and the industrial policy of “national plan. ”

• 160 •